
评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

曲家源

近几年, 在一些出版单位努力下, 相继出版了一些系统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丛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史丛书”, 就是其中之一。专门史丛书应该具有学术性, 即在史料的挖掘与运用, 分门别类研究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历史的某一侧面时观点的创新, 以及为了充分地说明新观点而确定的独特的叙述方式等方面要达到新水平。“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就是这样向读者承诺的。但学术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如果学术准备不足, 仓促从事, 单凭良好的愿望, 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认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徐勇著) 就是一本有缺陷的书。

作者徐勇同志自 1985 年即开始研究日本历史, 受过专门的日本军史研究训练, 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工作, 参加过该部编写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工作。作者得天独厚, 有条件查阅在大陆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有关的中外文献资料。所以, 这本书取材丰富。据粗略统计, 全书参考中外书目共 105 种, 引用资料达 800 多条。而且该书研究角度独特, 用日本侵华战略的谋划与实施来展现日本侵华战争的过程, 便于把全局与局部、幕后与幕前、前因与结果等关系交代清楚, 更便于读者从理

该书“附录二”所列参考资料是 104 种, 其中张宪文《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重出; 而书中引用、书目中却漏掉的有两种: (一) 第 132 页引原四郎《没有大战略的开战》, (二) 第 272 页引林茂《日本内阁史录》。

论的高度认识抗日战争史。这本书本来应该成为一本有价值的书。

然而,遗憾的是,在读过全书以后,却有些失望。不错,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史料,但他对这些史料尚没有认真研究,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就匆忙下笔著书,使这本书没能达到如标题所显示的独特价值水平。具体地说,我以为该书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叙述方式问题

学术研究的结果一般都表现为一种叙述(论述)。马克思在谈到学术研究时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充分地占有材料仅仅是学术研究的起步,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深入分析历史事件的独特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项工作没有认真进行,那就无法把研究对象正确地叙述出来。

关于叙述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有两种可以采用的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历史的方式遵循的是“自然线索”,逻辑的方式则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进程”。虽然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方式互相渗透,历史的叙述中有逻辑的演绎,逻辑的叙述中有历史的顺序,但从总体上说,这两种叙述方式还是有明显界限的。每位学者无不根据自己的研究性质而先行确定叙述方式。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独特的叙述方式。反过来说,重复别人的叙述方式也必然导致其内容的陈陈相因。

日本侵华战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变故多,内容复杂,可以从各种角度来研究它。如果选择日本侵华战略的角度,那么首先应考虑它的逻辑叙述问题,即以“日本侵华战略”作为叙述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第2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以其战略目标、战略原则、战略内容、战略阶段等要素来架构全篇，是为经；而以时间为纬，从而展现出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部复杂性。逻辑叙述方式要求以事归类，从中归纳出相关概念，这样才能把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征服之梦》名为对日本侵华战略研究，实际却没有做逻辑归纳工作，而是简单地以历史事件的自然铺展作为替代（只是在各段节的小标题中加上“战略”字样）。全书九章，基本是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这就与以前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没有什么区别。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日本自 60 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侵华战争史著作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尤其是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战史丛书”，披露了日本侵华时的大量档案材料、大本营的机密文件、日志和颁发的命令，以及政府要员、高级参谋人员的笔记和日记等等。这些书籍对日本的国策战略政略，各年度各时期各战役的作战计划、作战经过都有或详或略的转载和介绍。应该说，现在研究日本侵华战略并不困难。问题是，我们要避免陷入资料堆中迷失自己的目标。从《征服之梦》可以看出，作者受“战史丛书”中的《大本营陆军部》和《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影响甚大。如果说要了解日本的侵华战略、作战计划要从这些书籍中取材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在选材角度、叙述方式、历史评价方面，作者就必须保有自己的特性，否则，写作这本书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征服之梦》在历史内涵方面基本没有超出《大本营陆军部》的框架。《大本营陆军部》以资料浩繁著称。它基本以时间为序展示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包括海军军令部）在侵华战争时期对中、美、英、苏等国家的战略策略，以及这些战略策略的形成过程和执行结果。受编撰者狭隘思想的局限，它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均以当事人、当时人的观点为据，没有编者自己的看法（或说编者的看法与侵略战争当事人相同）。我们只能把它当成资料书看待。其实，日本大本营当年制定的那些方针、计划、纲要等等，对他们称霸东亚的野心极少掩饰，一意灭亡中国的图谋也不讳言，只要把那些历史资料展示出来，也就把当年日

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了。不仅中国人民,所有曾经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读《大本营陆军部》都不会对这起码的历史是非分辨不清。问题是,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在介绍这些历史资料的同时,还能给读者提供什么新的认识呢?在这个方面,《征服之梦》给予读者的似乎不多(关于书中一些观点问题,后文将论及)。作者没有超出那些“战史丛书”的论述框架,这极大地限制了从新角度认识事物的能力。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研究方法问题,牵涉到其他许多方面。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在其他方面不论多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

(二) 引文问题

该书占有资料丰富,引文多,但引文的问题也较突出。言必有据,本是学术研究的原则之一,但《征服之梦》引文过多过滥。全书400页,几乎页页有引文,多者达6条,7条(如第90、108、132、351页)。其中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有些引文不得要领,以“文”害意,不如不引。尤其是多数引文无头无尾,片断孤立,连一句完整的话也不够,往往只有几个字掺杂在作者的论述中,到底原意为何?可否作为依据?读者难以判断。引文一般都是作为论据来使用的。别人整理的资料,或别人研究的结论,可以为我所用,但引者必须保持原文文意的完整;如果只需其中关键的几个字,那么也必须把原文文意交代清楚。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之嫌,而且也是对别人(包括论敌)劳动的尊重。《征服之梦》处理引文的做法是不妥的。

此外,该书引用日本方面资料多,特别是大量引用当年日本政府、军部的各类文件。对这些文件的引述,作者多用转述或夹叙夹议的方法,而不是全部引用原文。这不仅涉及到理解原文的准确性问题,而且还产生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国和日本在1945年以前是相互敌对的;作者既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些侵略计划、方案,又要如实表述出这些计划、方案所包含的对中国的敌意。这样,在操作中就常常表现出敌我不分和是非不分。例如,日本1932年在中国东北四省炮制了一个“满洲国”,以后其文件中屡屡

有“日‘满’华”字样。对这个“满洲国”，中国人民和政府从来都未予承认。我们在提到“满洲国”时均冠之以“伪”。但《征服之梦》在介绍日本政府方针时，均把“满”不加任何标志地与日本、中国并列称呼。再如日本文件所称之为“敌”，均指中国。那么中国人在介绍日本文件时难道也把中国称“敌”吗？这本书有几处确是这样作的。如第199页“摧毁敌之抗战意图”；第291页“遮断敌之补给线”等都是作者的叙述语，但用的都是日本口吻。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中，为了欺骗舆论，常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们必须反其意去理解才能看穿它的真意。例如“中日经济提携”、“共荣”、“合作”等等，那是日本对中国实行经济资源掠夺、压榨、奴役的同义语，而《征服之梦》在介绍日本“经济合作”原则时竟说：“在产业经济等方面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以共同互惠为原则。”（《征服之梦》第201页，以下引用该书文字，只标明页码）另一处介绍一份日军文件，竟称用大规模作战击溃国民政府为解决中国事变的“曙光”（第217页，原文未加引号）。真不知作者何所云。

该书有一种偏爱引用日方资料的倾向。研究日本问题当然主要引用日方资料，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涉及到中国方面的情况，就该尽量用中方资料。不然的话，日本难道比中国更清楚中国的情况吗？该书第194页介绍国民政府防卫武汉的兵力部署竟出自日本桑田悦、前田透的《简明日本战史》。第227页介绍日军轰炸重庆，给重庆造成损失的情况也出自日本战史丛书《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还有，日军进攻台儿庄失败，关于日军的伤亡，该书第181页说：“日方记载其伤亡约1.2万人。”日本军队因为怕损伤其“皇军威武”，在公布战果时一向夸大战果而讳言自己的损失和失败。日军在台儿庄的伤亡，中国方面掌握的数字是“二万以上”（见《李宗仁回忆录》。李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曾亲临台儿庄战场）。据《团结报》1988年4月9日刊载的《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没有夸

大》一文统计,日军伤亡人数为 28920 人。作者为何不用这个数字,或至少把这个数字作为参考呢?

(三)几个值得商榷的观点

1. 关于日本的“不扩大”派问题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部过程中,经常能看到有所谓“不扩大”的说法。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还形成了一个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与扩大派的另一些人有过激烈的争论。许多日本战史书籍对这个“不扩大”派都大书特书,好象“不扩大”派是反战的,甚至是反对侵略中国的。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我在《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中曾经指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对于日本走上大规模侵略道路和日本给中国造成历史空前的巨大灾难来说,没有本质不同。那些争论其实都毫无意义”。但遗憾的是,《征服之梦》对于日本当年那些“不扩大”的说法和“不扩大”派的主张都是真诚相信的。作者认为,1936年石原莞尔对日苏在远东地区兵力对比的悬殊“感到震惊”;对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深感忧虑”;从而形成了他“不扩大”的主张。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三天,即7月9日日本四相会议发表了“不扩大”声明是石原的功劳。作者对石原“不扩大”派评价甚高,说:“石原等不扩大派的有限活动,虽部分地影响了军部的战争政策,却没能完全阻挡住战争的迅速升级。”又说:“不扩大”派“反映出军国主义对外战争政策面临危机。特别是石原等不扩大派在七七时期登场,标(表)明了日军对华战略的僵局,必将随战争的升级而恶化”。(第142页)“面临危机”、“僵局”云者,不知从何谈起,姑置不论;说石原等人“部分地影响了军部的战争政策”,阻挡了,只是“没能完全阻挡住战争升级”,也是对“不扩大”派的过分美化。

转引自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页。

曲家源:《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这里有一个研究政治问题的原则应该首先弄清,即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意图,是以个别人的言论为准,还是以政府的声明、指令为准?与此相联系,是以政府的声明为准,还是以政府的行动为准?不错,日本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第三天确实发表了“不扩大”声明。但先要辨明,即使按“不扩大”一词的本义去理解,“不扩大”也不是不侵略,更不是退让。所谓“不扩大”,首先是坚持维护日本已得到的利益,已达到的目的,只是“不”再另外要求而已,这有什么值得肯定的?而且,7月9日四相会议决定“不扩大”,但条件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日本要求中国军队从中国国土上撤退,是“不扩大”吗?同一天,作为第一部长的石原指示参谋本部作出的《处理华北时局要领》规定:“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的兵力,将与我对敌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方面。”这是石原“没能完全阻挡住战争的迅速升级”吗?7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立即向华北增派三个师团,这又怎能说是“不扩大”呢?

实际上,对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的平津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不扩大”,不过是日军的一种缓兵之计。当时平津形势,据日军估计,中国第二十九军总兵力约75000人,而日军只5600人,两军相差十一倍。日军以这样少的兵力是无法把二十九军“驱逐”出平津的。现地日军一再要求与冀察当局停战谈判,而大批日军正是在谈判期间陆续沿北宁路和塘沽港开进平津的。至7月28日,日军调动就绪,就一举把二十九军“驱逐”。

尤其让人不解的是,《征服之梦》很热衷强调日本在整个侵华战争时期所说的“不扩大”,几乎对日本文件中所有提到“不扩大”的地方都加以引用(见第176、177、181、184、185、186、187……等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以下简称《陆军作战史》)第1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9页,第138页。
《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25页。

页)。这实在是当年日本所使用的“不扩大”一词还不理解,对日本“战史丛书”也没有读懂的缘故。

“不扩大”一词不是石原莞尔的发明,而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一句口头禅。在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同时期,其含义也不同。在实行激进的蚕食政策时期(1931—1937年)，“不扩大”义为“克制”。这是日本的一种自我美化,对中国则是一场骗局。日本正是在“不扩大”、“就地解决”的口号下一块块地蚕食中国领土的。卢沟桥事变时期,石原莞尔因顾虑对苏战备不足,主张先经营好“满洲”;待国力充实后更容易地征服中国,而不要现在就同中国全面开战,以免陷入长期战。他同扩大派的争论,更多的是个人意气用事(所以他很快失势,被调出参谋本部)。石原既然肯定日本侵占东北是正确的,就谈不上什么“反战”、“反对侵略中国”。待到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以后,1938年2月16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以暂不扩大作战面为一般方针”,这个“不扩大”已不是政策方针,而是作战方针。因为日军连续进行了几次大战役,兵力需要休整,占领区需要巩固,下一步作战方向需要研究,客观情势不容日军立即扩大作战。这个“不扩大”已不含“克制”的意思,而是“休整”的代词,更加不值得重视。而事实证明,这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御前会议作出“不扩大战面”的同时,日军的行动却没有停止过,而且很快就进行了徐州作战、武汉作战和广州作战,作战面很快扩大到华中和华南广大地域。对日本资料中如此明显的巧言假言都没有识破,足见《征服之梦》受《大本营陆军部》影响之深。

2. 关于对日军徐州作战、武汉作战的评价问题。

徐州作战和武汉作战是日军继1937年攻占平津、上海、南京之后,在1938年进行的两次重要作战。徐州作战使日军打通了津浦铁路,使它的华北占领区与华东占领区连成一片。武汉作战占领了平汉、汉粤铁路与水运大动脉长江的交汇点武汉三镇,再加上同期占领的广州,中国的半壁河山尽落敌手。日本初期的战争目标已基本达到。但《征服之梦》却认为这两次作战对日本来说都是“失

败”。

否定徐州作战的根据，一是“这一作战目标是三个月前日军统帅部曾加以讨论并否定过的方案”；二是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战后回忆说“其作战意义甚小”；三是《大本营陆军部》“记载‘战果之微出乎意料’”（第185页）。依据日方片断材料来评价事物是该书的主要毛病之一，这是又一个典型的例子。

徐州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北陷平津、济南，南陷上海、南京之后，进行徐州作战，北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是它巩固其占领地，给中国以重创战略的必然选择。而国民政府在连遭惨败之后，也亟需巩固阵脚，与日军进行一场决战，以振奋人心。所以早在1937年12月31日，蒋介石即电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韩复榘：“主力须分布于泰安至临沂一带、泰山山脉地区之各县，万勿使倭寇垂手而定全鲁，以为收复失土之根据。”当3月初鲁南告急时，蒋介石即从第一战区、第二战区调集大批部队增援第五战区，其中包括蒋的嫡系精锐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徐州，按中国的情势，志在必保，这样才有不怕牺牲的台儿庄大捷。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占领了徐州，打通了津浦线，并且为下一步攻占武汉的作战准备了前进基地，主要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另一目的是企图围歼汤恩伯军团，没有达到），所以不能认为其“意义小”、“战果微”。

关于武汉作战，《征服之梦》说：“从战略意义上说，日军的武汉决战遭受了失败。‘既然攻占了武汉三镇，迫使国民政府第二次迁都，为什么还说失败呢？’该书论证说：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认为，‘大会战必须以消灭敌人的军队为主要目的’。而武汉作战没有消灭国民政府军队，‘当然应视为失败’”（第196页）。这论证比议论徐州作战更显书生气十足。

诚然，消灭敌人军队是所有战争的主要目的。不能消灭敌人的

军队,其他任何目的也无从谈起。但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一个战役的成败,主要应看作战双方各自确定的具体作战目的是否达到。国民政府划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在长江南北设防,作战目的是“保卫武汉,歼灭敌人,达成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但武汉没有保住,失败了。日本决定进行攻占武汉的作战,其目的是:(一)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二)“为了对重庆进行轰炸,占领武汉周围也是很必要的”。这表明,日本决定武汉作战,是以占地为主要目的。1938年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作出的《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对占地战略还有更具体的说明:“以占领足以控制中国大局的重要地区为目标,进而指向不间断的积极作战,让敌人连战皆败,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陷落,将引起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从这一点来看,日军占领武汉也达到了作战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认真地、严肃地批判,但历史批判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故意夸大或缩小事实的意义,只能导致我们对历史的误解。把当年日本军队在徐州作战、武汉作战中夺去我数十万英勇战斗、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寇飞机、大炮、坦克进攻的中华儿女的生命,霸占了我大片国土,肆意掠夺我国家资源财富的罪行,说成是“战果甚微”,是日军的“失败”,岂不是给历史倒帮忙吗?

3.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有“迷惘”、“徘徊”、“动摇”的问题。

《征服之梦》在论述日军攻占南京后决定进行徐州作战和武汉作战的战略时说:“日军暂不扩大战面的方针得不到贯彻,而已确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第466页。

《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90页。

《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97页。

认的长期持久战略又不能按计划推行。由于战场的危机实况,被迫发起新的进攻势头,提前一年实施了原订进攻武汉的决战。日军持久战略的设计及其推行与变化,反映了日军在战略抉择问题上又一次陷入迷惘和徘徊。”(第 177 页)有关徐州作战该书认为,“显然,日军在战略指导上是动摇的、被动的”(第 185—186 页)。日军在 1938 年 10 月攻占武汉、广州以后,又一次决定“不扩大战面”,确定长期持久作战方针。但 1938 年 12 月又进行了晋南作战,1939 年 2 月攻占海南岛,3 月攻占南昌,9 月进攻长沙,11 月攻占南宁,此外在苏北、鲁西、晋东、潮汕等地四面出击,扩大占领地。这本来正足以说明日本所谓的“不扩大”纯属谎言,而《征服之梦》却认为这是“日军在战略指导方面再度发生动摇”(第 216 页)。“日军虽决定在战略上转入长期持久态势,但实际上不能克服战争危机,自然无法摆脱战略抉择上的动摇”(第 217 页)。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英在南太平洋开战。《征服之梦》认为,这“使日本对外战争的中心和目标发生被动性飘移”(第 283 页)。“日军在不顾国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还竭力扩大和强化侵华战争,使日军的侵华战略发生新的摇摆”(第 292 页)。把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在不同阶段根据中国形势和世界形势对战略布局与战略重点进行本属正常的调整和改变,说成是什么“迷惘”、“徘徊”、“动摇”、“飘移”,如果不是故弄玄虚,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侵华战争缺乏认识。

日本帝国主义在 19 世纪末跻入列强之列以后,就深陷在无限贪婪的扩张野心与资源贫乏、国力不足的巨大矛盾之中。在日本称霸世界的战略中,北方的苏联、南方的美国是它的主要敌人。它要把中国尽快降服后,以便利用中国的资源同美、苏作战。但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意外地遭到只有简陋武器的中国军队的猛烈抵抗。日本只好不断增兵,不断增加作战资材,不断扩大作战面。而这又与其对苏备战战略相矛盾。于是日本军部就出现了一方面要坚持对苏备战既定方针,不要在计划外的中国陷入太深,消耗国力;另

一方面又不能放弃征服中国使之成为它的附庸的另一既定方针的两难局面。如果没有中国作为附庸,日本只是“小日本”,称霸云云,就成了白日梦。这就是日本大本营在每一次对华作战计划中都唠叨“不扩大”,而实际上又不断扩大的原因。但是这种矛盾绝不能称之为“迷惘和徘徊”。日本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从来没有“迷惘和徘徊”或“动摇”或“飘移”过。侵略中国与对苏备战有矛盾,但日本都是用牺牲对苏备战来加强对中国作战的。1944年上半年日本进行“一号作战”(即豫湘桂作战),兵力不足,从以对苏备战为主要任务的关东军抽调大批军队,使关东军由原来的70万人减至40万人。甚至日本在对美英作战失利,节节败退的情况下,还幻想霸占中国,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政战两略的施策,让中国成为它的陪葬品。这怎么能说“迷惘”、“徘徊”或什么“飘移”呢?

至于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对外战争中心从中国转移到西南太平洋,战争目标改变为与美国决战,这也是极表面的看法。日本此时的对美战争,不是石原莞尔早年设想的各自代表东西方文明的世界最后大战,而仅仅是争夺西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制海权(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截断中国的外援路线。日本另一个战略目的是劫掠东南亚的战略物质,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但这也是为了加速对中国的战争进程,早日征服中国。日本的这一战略目标并未改变。至于作战中心,日美间的海空大战和海岛争夺战也没有改变中国战场仍是日本对外战争的中心地位。它对中国的军事打击和政略瓦解都丝毫没有放松。1942年日本在中国原有四川作战和西安作战的计划准备,规模都是空前的。如果按计划实施,国民政府将更加难堪。但后来取消了,不是因为作战中心移开了中国,而是日本战略已经由“军事打击胁

东条英机1941年10月14日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发言用语。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节译本)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9页。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816页。

迫国民政府屈服’改为“摧毁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基地,防止空袭日本本土”。这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走上穷途末路,而不是什么“飘移”的问题。

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是战略学的学术问题,而且是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中日两国的历史及其关系的问题。中国人在关注它、研究它,日本人在关注它、研究它。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观点、结论以及所运用的资料等等,涉及到历史的是非,民族的荣辱,我们不能不持极慎重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徐勇同志的《征服之梦》提出了以上意见。不当之处,尚望批评与指正。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荣维木)

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评介

李吉奎

徐勇所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以下简称《战略》)一书,为《抗日战争史》丛书·军事系列之一种,于199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约35万字。著者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曾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工作,参加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等书,具有较深的研究功力。

有关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研究,日本已出版了多种专著。在中国方面,台湾出版的《抗日御侮》第2卷及第10卷《总检讨》部分,对日军战略作了分析;大陆发表的一些论著对此也有所论列,但尚未有专著出版。因此,《战略》一书的出版,实际上填补了国人在此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很有意义。